

青海民族学院学术
系列丛书之二十四

青海蒙古语言

贾晞儒 著

文化纵论

青海民族出版社

青海民族学院院长基金资助项目
青海民院民研所重点学科建设文库

青海蒙古语言文化纵论

贾晞儒 著

青海民族出版社
2006年·西宁

青海蒙古语言文化纵论

QING HAI MENG GU YU YAN WEN HUA ZONG LUN

贾晞儒 著

出版发行：青海民族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经销：青海省新华书店

印刷：青海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9.625

字数：230千

插页：1

版次：2006年6月第1版

印次：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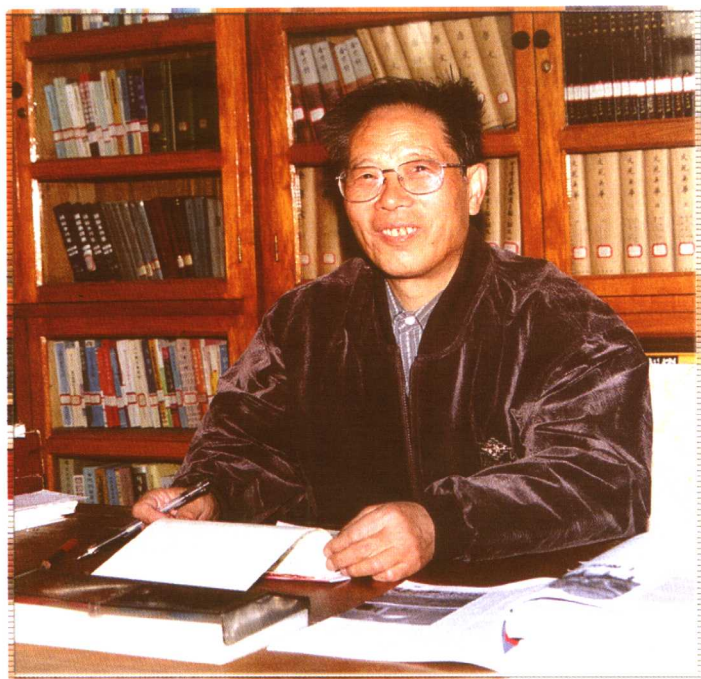
印数：1—1 000

书号：ISBN7-5420-1220-7/H·25

定价：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印刷厂联系)



作者简介

贾晞儒(1936~),汉族,陕西省蓝田县人,20世纪50年代就读于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语文系蒙古语文专业。自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先后担任青海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副主任、民族研究所所长及《青海民族研究》主编,兼任中国蒙古语文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副会长、青海省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青海省少数民族语文古籍整理编纂委员会评审委员、《民族语文》(北京)编委会委员等社会工作。现担任中国蒙古语文学会顾问、甘肃方言研究所学术顾问、青海省老教授协会副会长等职。享受政府津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约130万字,出版个人著作《民族语文散论》、《语言·心理·民俗》等3部,主编和参与撰写出版《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教育读本》、《青海方言志》、《中华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故事》等10部。其中,荣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专著)1~2等奖各一项,论文三等奖6项。主要学术成就和观点已载入和收入《当代中国民族语言学家》、《中国语言学人名录》、《中国民族语言学史》、《蒙古学百科全书·语言卷》、《世界语言教学研究中心文库》等学术书刊;主要文学活动亦载入《中国文艺家辞典》一书。

序

李克郁

蒙古民族发祥于崇高而庄严的不儿罕山下，饮斡难河、克鲁伦河、色楞格河的圣水成长壮大。这个强悍的民族到了帖木真时代，统一了蒙古高原，进而征服了欧亚大陆。于是，蒙古贵族在许多地方建立起政权，成为统治者，随从部众也定居了下来，发展繁衍。

根据汉文史籍的记载，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第一次驰入神秘的青藏高原。古代蒙古族首领，军事家和政治家成吉思汗破临洮，攻积石，下西宁，所向披靡。蒙古铁骑占领青藏高原东部重镇西宁后是否留军此地，史无确凿记载，但互助、民和土族群众中有关这方面的传说很有参考价值。民和土族人徐秀福先生1985年对三川土族的调查资料说：“相传在元朝初期，成吉思汗率军西征，把一部分军队留在了三川，他们边守黄河，边开垦种地，在7月庄稼丰收后，他们喜庆丰收。后来当地的土著人也参加了进来，就形成了现在的纳顿。”中川乡的甘文德在谈到土族“纳顿”的来历讲了同样的故事（以上资料由互助土族自治县宗教局提供）。土族语中的“纳顿”一词是“那达慕”（*naɣadum* 玩耍，游戏）一词的异译，因为这个词在土族语互助方言里是 *naadum* 或 *naadun*，在民和方言中是 *naadun*，词尾的双唇鼻音 *m* 读作舌尖鼻音 *n*，故有此译。

蒙古人大批进入青海的时间大约在太宗窝阔台时期，藏文《安多政教史》云：“这里（指华热，包括今互助、乐都、甘肃天祝的部分地区）还有阔端的大臣们之后裔，祁家、李家、吕家、杨家等众

多小首领。”(见止贡巴·贡却丹巴然杰著,星全成、尼玛太译,黎宗华校《安多政教史》,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内部铅印,第20页)黎宗华、李延恺著《安多藏族史略》亦云:“阔端为了直接统治广大藏众,便命其近臣充任地方首领,如西宁地区之吉土司、李土司、杨土司、祁土司,连城的鲁土司,以及纳土司等,皆系阔端属臣,而且均系蒙古贵族。”(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1958年,土族社会历史调查队在佑宁寺调查到类似的传说。调查资料写道:“成吉思汗的后代,有阔耶(指定宗贵由)、阔端,他们听了母亲的话,将自己的部队领到西宁以北的血拉塔拉(“黄滩”的意思),被部众拥立为王,凉州长城以内地区,都归他管辖。阔端的部队,到后来就分出了祁、吉、李、鲁、杨各土司。”(见《青海土族社会历史调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藏文之记载和民间传说完全证实了1229~1244年间大批蒙古人进入河湟的事实。从阔端于1244年邀请萨斯迦·班哲达赴凉州和1247年在凉州与萨班会谈一事看,至少1244年阔端已经在凉州。这个时期,太宗窝阔台已去世,由乃马真监国时期,因此,说“他们听了母亲的话,将自己的部队领到西宁以北的血拉塔拉,被部众拥立为王”之事,与史亦合。阔端坐镇凉州,统辖甘肃,西宁地区也在他的管辖之内。

受命驻守河湟地区的阔端属臣,蒙古贵族们到了世祖忽必烈时期,与这里的古老民族藏族有了特别良好的关系,从而蒙古人建立起了自己稳固的阵地。至元六年(1269年)十月,忽必烈第七子奥鲁赤被封为西平王,金印紫绶,至元十六年(1279年)七月,以朵哥麻思地之算木多城(今互助土族自治县境内)为镇西府,奥鲁赤坐镇王府,受管理西藏军务,为最高军事长官,军需全由朝廷供给。奥鲁赤后裔的一支衍为明清时的西祁部落,他的孙子贡哥星吉的墓地就在互助土族自治县多时代牛头山根。藏文《佑宁寺志》“关于霍尔的历史,从前霍尔王(成吉思汗)的后裔额尔丹王

(即奥丹王)带领他们的许多家人来到这里,相传后来融合于郭隆地区,居住在威远堡,建立了一座神殿,皇帝赐下了纸牌,后称为钦旨,不清楚是何时代。”的记载恰是追忆此事。另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正月,封驸马长吉为宁濮郡王,镇西宁,并以西宁州为驸马长吉封地。长吉是蒙古化的沙陀人(既已蒙古化,亦算蒙古人),其祖先在唐为雁门沙陀李仆射克用,在元为成吉思汗驸马拜哈。拜哈曾孙即长吉,长吉从子为西宁州都督指挥同知,其后裔归朱明后衍为西碾李氏三部落。

元永昌王阔端的后裔阿难答幼年喜读《古兰经》,笃信伊斯兰教。他继前辈经略古唐兀之地,部下有15万官兵,其中的大半随首领阿难答皈依伊斯兰而成为蒙古中的穆斯林,朝廷的干预也未能奏效。回顾这段历史,对于理解下面将要谈到的元代甘肃驻守蒙古人的演化过程是有帮助的。

1368年,蒙古帝国崩溃,由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取而代之。随着蒙古帝国的灭亡,分散地居住在欧亚大陆各地的蒙古人完全失去了彼此间的联系,与本部蒙古人没有了来往的条件。于是,居住在各地的蒙古人的地方特点进一步活跃起来,各自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最终形成了蒙古语族各个民族。如本部(蒙古和我国)蒙古人形成了现代蒙古族;居住在贝加尔湖一带的,原属林木中百姓的蒙古人形成了布利亚特蒙古族;居住在里海岸边的土尔扈特人(满清时期,在其首领的率领下穿越哈萨克斯坦,至伏尔加河流域游牧),形成了卡尔梅克蒙古族;居住在阿富汗的蒙古人形成了莫戈勒族;居住在我国东北海拉尔、尼尔基的部分蒙古人与当地的爱门人(据说为契丹后裔)相融合形成了达斡尔族;居住在我国甘肃省的西蒙古驻军,在其首领的率领下,于1368~1372年间相继归附了明朝。从1368~1509年,近一个半世纪,今甘青地区只有“土人”的活动而无蒙古之行迹,究其原因,皆因今人不察蒙古与“土达”、“土人”为同义语。

明清二代,操蒙古语的甘肃“土人”居住在黄河、浩门河、湟水河、隆务河及庄浪河的广阔区域里,内中可分河州洮岷“土人”、西碾庄浪“土人”、保安贵德“土人”和甘凉“土人”。甘肃“土人”是一个复杂的“土人”群体,他们之中既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土人”,又有信仰藏传佛教的“土人”。从成分上讲,他们是蒙古人、撒尔塔人、沙陀人、撒里畏吾人、汉族、藏族等多元的融合体。这个多元一体的“土人”群,后来由于地域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原因,特别是以宗教文化为核心的地域性特色文化逐渐形成,并日益凸现出来等原因,最终在河湟地区形成了4个独立的既相似又不相同的蒙古语族民族。他们是:以原阿难答部下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 and 中亚来的桑塔(santa)人为主形成,自称桑塔的东乡族;以原阿难答部下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和细回回(西域穆斯林)为主形成,自称保安的保安族;以蒙古人和蒙古化沙陀突厥人为主形成,自称蒙古尔(mongol,蒙古)、察罕蒙古(tc'aGaan mongol,白蒙古)的土族;蒙古出伯部后裔和古回鹘人为主形成,自称尧乎尔的裕固族。这就是蒙古帝国崩溃后,元代的蒙古族逐步演化为蒙古语族各民族的大致情况,也是统一的蒙古语逐步形成现代蒙古语、卡尔梅克语、布利亚特语、莫戈勒语、达斡尔语、东乡语、土族语、裕固(东部)语、保安语等9种独立语言的大致过程。

如前所述,1368~1509年的近一个半世纪里,青海这块土地上只有甘肃“土人”的活动而无蒙古人的活动。自1509年河套蒙古亦不剌、阿尔忒斯入牧西海起始有青海蒙古(或曰西海蒙古)。从1509~1636年的100多年里,青藏高原是个处在动荡不定的时期,察哈尔蒙古、鄂尔多斯蒙古、喀尔喀蒙古亦先后入居青海,你来我往,互相兼并,战争不断,给各族人民带来了不幸。1636年,卫拉特蒙古在顾实汗(又作固始汗)的率领下进入青海。顾实汗以他的智慧和果敢粉碎了却图汗、藏巴汗和白利土司的联盟,确立了卫拉特蒙古在青藏高原的霸主地位,其后裔延至今日。贾晞儒同

志的《青海蒙古语言文化纵论》是一部研究现代蒙古语卫拉特方言青海蒙古语的学术佳作,对蒙古语言学提供了新的内容,对蒙古语族语言的比较研究,对蒙古语各方言间的比较,乃至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对蒙古语的规范、标准音的推广都有现实意义。

卫拉特是一个很古老的部族,属林木中百姓。据史书记载,1217年,蒙古贵族豁儿赤前往驻牧于叶尼塞河流域的秃马敦部挑选美女(在先成吉思汗应诺豁儿赤可以娶30个妻子,故有此举),被秃马敦部将他捆绑了起来。遂卫拉特部奉成吉思汗之命前往征讨,其首领也被秃马敦部虏为人质。蒙古大军破秃马敦的反叛后,那位年轻美貌的秃马敦女首领嫁卫拉特首领为妻。从这个故事中得知,卫拉特是一个很重要的部族,是一个13世纪初就有的部族。这个部族经历了800年的风风雨雨,迄至今日依然活跃于祖国西部边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那么,800年后的卫拉特语言是怎样的呢?它给我们有些什么启示呢?贾晞儒同志的《青海蒙古语言文化纵论》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生动的语言学资料。

在13世纪时,蒙古人的语言是统一的,胡都木书面蒙古语是这一时期共同蒙古语面貌的真实反映。此后,蒙古语发生了革命性的发展。关于这个问题,著名的蒙古语言学家桑席叶夫曾经有过生动的描述:约13~14世纪时,元音间舌根塞辅音/g/、擦辅音/j/和唇辅音/w/转变为摩擦清辅音/x/,它在整个13~14世纪中,在许多方言里都一直保留着,八思巴文字的语言材料说明了这一点;古典语(旧书面语)的语音面貌告诉我们,这个摩擦音约在12~13世纪中已经有了;大约到13~14世纪时,元音间的摩擦辅音消失了,从而构成双音节(元音加元音,未必是复合元音);直到14~15世纪,双音节(元音加元音)在极短的时间内合并为一个单音节(复合元音),进而发展成为长元音。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相同

元音比较容易地在短期内形成了长元音,不相同的元音虽然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最后还是发展成了长元音。属于卫拉特方言的青海蒙古语与其他地区蒙古语的发展是同步的,音节的缩减和长元音的形成就是明证。如:

书面蒙古语	青海蒙古语	词义
qalayun	xaluun	温的
takiya	takaa	鸡
temege	temee	骆驼
egude	uude	门
ulayan	ulaan	红色的
qayučin	xuufin	旧的

联想到同语族的土族(蒙古尔)语,它虽然经历了13~14世纪蒙古语长元音形成的过程,但还没有完成这个过程就与其他蒙古人分开了,表现在摩擦辅音脱落后,两个相同的元音形成了长元音,如:fulaan(红色的)、temeen(骆驼)、naadum(纳顿、那达慕)。两个不相同的元音尚未形成长元音,而只以复元音形式存在于土族语言中。如:xaudzin(陈旧的)、mauxan(丑劣的)、daula-(歌唱)、sau-(坐)、bau-(下降)等。

蒙古语摩擦辅音的脱落,长元音的形成带来了语言的革命性演变,除此而外,蒙古语重音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一般来说,蒙古语的重音在词的第一音节的元音上。蒙古语族9种语言中,东支蒙古语如蒙古语、布利亚特语、卡尔梅克语、达斡尔语的重音在词的第一音节,而西支蒙古语如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裕固语以及居住在阿富汗的莫戈勒语的重音在词的末一音节的元音上。同为蒙古语族语言,为什么重音在相反的两极呢?这始终成为一个谜。过去依蒙古语长元音形成过程中总是后面的元音战胜前面的元音的情况,提出了古代蒙古语的重音可能在词的末一音节的设想,近年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揭开河湟地区四个独立的蒙古语族民

族形成的历史后,对西支蒙古语的重音为什么在词尾的问题基本有了一个符合实际的答案。那就是语言学界称作西支蒙古语的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裕固语受到突厥语的影响,无论东乡族、土族、保安族,还是裕固族,他们之中有很大数量的蒙古化的突厥成分,如桑塔、沙陀、撒里畏兀等。突厥人转用蒙古语是突厥民族蒙古化的显著标志,可以断定,突厥蒙古化的过程是词的重音由词头向词尾转移的过程。西支蒙古语重音的转移,促使蒙古语族语言间的关系拉大,开始走上了分道扬镳的途径。由于重音的作用,东支蒙古语词尾元音消失,形成许多词尾复合辅音,词的音节向词首方向紧缩,西支蒙古语恰好相反,词首元音脱落,形成许多词首复辅音,词的音节向词尾方向紧缩。如书面语 *ayula* (山) 在现代蒙古语(包括青海蒙古语)里是 *uul*, 而河湟几个民族的语言里是 *ula*, 形成了你要前半部,我要后半部的情况。

在现代蒙古语里 *i* 元音的作用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音往往对临近的元音产生某种影响,这种影响有时甚至影响到语言的音位系统。关于这个问题,晞儒同志有专门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很值得一读。总之,《青海蒙古语言文化纵论》是一部难得的学术佳作,其中对青海蒙古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以及语言与文化都有专题研究,研究的范围广泛,材料丰富,论述生动,观点新颖,读了之后必将大增知识,开阔眼界。

2005 年 9 月 30 日

自序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80年代初期,我有幸第一次接受组织的指派,到海西蒙古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蒙古包里与牧民群众直接交谈,体验蒙古族人民的朴实生活和淳朴的精神、情感。在交谈中,我虽然还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那种方言,但已深深地感受到了他们的语言魅力。从其话语中随时都可以听到有趣的故事和寓意深刻的谚语、格言,简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和智慧宝藏。于是,让我想起了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苦闷的热带》中说的一句话:“谁要讨论人,谁就要讨论语言,而要讨论语言,就要讨论社会。”这是经典名言,它道出了语言与人、语言与社会的密切联系,指出了语言是观察社会风貌的窗口。到了乌兰县,恰巧遇到了我的几位蒙古族学生,他们大学毕业已经工作了好几年,利用工休时间,自费深入牧民群众之中进行民间文学的调查、搜集工作,风餐露宿,十分辛苦。我被他们的这种执著的精神所感动,也产生了一个念头,并且向州有关部门和领导建议组织一部分民族文化专业人员和热爱民族文化事业而又有一定文学基础知识及能力的同志,集中力量,全面搜集、整理包括语言在内的流传在广大蒙古族群众当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然而,未能得到理解和支持。时至今日,有一些十分宝贵的资源已经流逝而荡然无存,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青海蒙古语是现代蒙古语的重要方言之一,当地蒙古族人民虽然和国内其他蒙古族使用着同样的文字,但作为一种方言,许多特殊的成分还不可能被文字所记载,而这一部分又正是蕴涵和反映青海蒙古族

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特征的重要资源,在我们进行小康社会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迫切需要我们发掘它、研究它,使它焕发活力,融入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成为推动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的精神动力。因为不论是小康社会,还是和谐社会,都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必须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割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联系,就必然导致观念的错位、思想的混乱,社会安定就会受到影响。

“语言是音义结合的词汇的语法的体系,它以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巩固并记载着人类思维的成果。……民俗与语言的关系十分密切。……民俗学和语言学的交叉领域就是语言和民俗的关系,就是语俗,即直接反映民俗的语言材料和直接反映语言体系中的民俗事象。”(曲彦斌:《民俗语言学·序/王德春》1989年版)正因为如此,我在后来的日子里,争取一切机会和可能去牧区,进蒙古包,学习具有地方特色的青海蒙古族语言,体验蒙古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退休前先先后后去过德令哈的怀头他拉,乌兰县的赛什克、蓄集、巴音、茶卡。但因1971年4月19日的一起事故留下了终身痼疾,不能较长时间奔波于牧区,所以记录的资料也是断断续续,很不完整。但是,在我每次调查和写作过程中,我的几位学生,原乌兰县民宗局局长彭茨海、原乌兰县县长田更、原海西州教育局局长巴依斯哈力和省政府翻译处副处长才仁巴力、青海民族学院蒙古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乌云其其格等同志都给了很大帮助,解决了许多我不太明白的问题,使我的研究得以顺利进行。退休后,又去过都兰县、格尔木等县市,同当地的一些蒙古族干部、教师和我的蒙古族学生就研究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作过交谈和核对。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历程已经进入了暮年,自然规律不允许我怠慢,必须只争朝夕,再作一些事情,以弥补多年的损失,释缓我内心的愧疚,这就是我要出版这部拙著的初衷。当然更重要的是,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特别是民族习俗,无不是通过它的语

言来实现和表达的。一个远离自己家园的和硕特族群,在旧时代的山隔水阻、人为的分割、连绵不断的战争和自然灾害中,是什么力量让他们终于由衰而强走了过来?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基本保持着民族的传统,没有忘怀自己的家乡?应该说,是国家的历史性变化,是族群的血缘,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力量。这一切都融会在,并表现在他们的日常生产劳动和日常的生活习俗中,贮存在他们须臾不可离开的语言之中。“民俗是源文化,是根文化,”是通过他们的语言,以口传身教,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地传播而根植于青海蒙古族人民的心灵中的。通过语言的日常渗透和经年的教化,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和社会的规范,维系着社会的安定,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语言是民族的文化财富,作为现代蒙古语青海方言,当然是青海蒙古族人民特有的文化财富,我们应该把这份财富整理出来,发掘它、研究它,激发它的活力,使之成为民族进步、社会发展的一支推动力而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在青海蒙古语里有许多蕴涵着民俗文化内涵的词语,其中有些就是反映蒙古族人民千百年来始终不渝地追求富裕和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思想。如饮食文化的 Šumur(须木尔)、son(松)、deedǵ(德吉)等无不表现出蒙古族人民的社会有序、和谐、富裕的理想追求。所以,我要说,了解一个民族,认识一个民族,热爱一个民族,只有通过学习和通晓他们的语言,才是最好的选择。

这就是我的写作旨趣和观点。

志思于廬舍

2005年10月1日

目 录

序	(1)
自序	(1)
绪论	(1)
(一)通过对语言特点的分析,加深对青海蒙古族及其 历史文化的认识	(2)
(二)正确认识民族文化的优势与劣势,激浊扬清,促 进发展	(5)
(三)发掘青海蒙古语言“富矿”,营造良好的社会文 化氛围	(11)

语 言 篇

一、青海蒙古语概况	(15)
(一)语音	(16)
(二)词汇	(23)
(三)语法	(39)
(四)句子	(68)
二、乌图美仁话中的[i]元音	(72)
(一)[i]的真正音值	(72)
(二)[i]在语流中的变化	(74)
(三)[i]在语流中对其他元音的影响	(75)
(四)[i]对其他辅音的影响	(77)

(五)几点启示	(79)
三、乌图美仁话中的[k]辅音	(83)
(一)古代蒙古语中的[k]辅音	(83)
(二)[k]是古代蒙古语的语音遗存	(85)
(三)[k]与[i]元音的组合	(87)
(四)[k]的历史音变	(88)
(五)结束语	(89)
四、海西蒙古语方言词	(91)
(一)方言词的构成	(91)
(二)方言词的构词特点	(93)
(三)方言词的语义特点	(96)
(四)方言词结构特点拾零	(100)
(五)规范方言词,丰富蒙古族语言词汇	(103)
五、[ɕu:]一词的特点及其归属问题	(106)
(一)语音结构的不变性和语法功能的多变性	(106)
(二)[ɕu:]在句子里出现的条件	(109)
(三)[ɕu:]的词类归属问题	(114)
六、海西蒙古语中的藏语借词	(118)
(一)藏语借词的三个来源	(118)
(二)借词的语音特征	(120)
(三)藏语借词在拉萨话和安多话比较中的中介作用	(124)
(四)借词的语义特征	(125)
(五)借词的使用特点及其原因	(127)
七、几个方位词语义的确定	(130)
(一)基本思路	(130)
(二)关于“方向”和“位置”	(130)
(三)几个方位词语义的确定	(132)